



红色收藏

珍藏一生的代表证

周再兴 李政 严宜荣

在江苏省句容市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内，有两件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开国少将段焕巍与夫人李珊的“中共七大代表证”，它们是目前国内唯一发现的夫妇俩同时拥有并保存完好的中共七大代表证。虽然段焕巍、李珊夫妇早已去世，但他们精心保存下来的这两张代表证，成为见证中共七大的珍贵实物。

中共七大代表证长8.4厘米、宽6厘米，长方形，呈对折状，紫红绫布镶面，封面没有任何文字或标志。打开内页，内文为繁体字，左页上方横印“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下方竖印“代表证”及编号。

内页中间靠下，盖有红色“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秘书处”椭圆形骑缝章，李珊的代表证在印章的左侧还盖有红色“候补”两字。代表证的证书号码、姓名、座位号均为手写。段焕巍的代表证号是“第六二二号”，座号是“22排14号”；李珊的代表证号是“第六六二号”，座号是“24排14号”。

1945年的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1938年11月到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各地750多名代表历经千难万险，突破重重封锁陆续到达延安，段焕巍、李珊夫妇就是当时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之一。

段焕巍，湖南茶陵人，1938年夏，跟随陈毅率部挺进苏南茅山开展抗日斗争，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李珊，江西安福人，14岁投身革命，抗战期间曾任中共皖南特委常委兼妇女部部长。1942年初，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七大代表集中到中央党校学习。1943年，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通知段焕巍、李珊夫妇等人，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并准备出席中共七大。



战国错银承弓器(山西博物院藏)

设计巧妙的承弓器

承弓器是一种不多见的古代兵器附件，其实就是配弩战车上的专属物件，作为战车行进时安放弓弩的固定支架。因为一件弓弩有两个渊部，所以承弓器都是成双成对地出现，一般设置在战车的左侧。

山西博物院所藏战国错银承弓器，于1954年永济县薛家崖村出土。不仅造型优美、装饰华丽、工艺精湛，且保存完好，十分难得。S型长颈，前端向上弯曲作长颈兽头状，后端为长方筒状銎，口部有固定用的穿孔，十分精美。它是我国先秦时期古代先民非凡的艺术想象与创造能力的直观再现，具有非常高的艺术研究价值。其巧妙的设计构思与审美意蕴传达，对当代艺术造型与设计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承弓器的曲线造型设计恰好与弓弩的两个渊部造型相对应。在使用时，成对组合的承弓器正好承托住弓弩的两渊部位，而弓弩的手柄部位则靠在车上，这样，弩机的尾端与承弓器的两个托点构成稳定的三角形。巧妙的是，它同时结合了以“弧形固定弧形”的设计构思。

依据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承弓器从战国到汉一直都在使用，且在山西、陕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古代墓葬中均有出土。不同时期出土的承弓器，差别之处主要体现在器首的造型及装饰细节上。器首的刻划、颈部上翘的角度、口含部分的细节处理不同。



红圈处为秦陵铜车马承弓器位置

泰宝宗

设计巧妙的承弓器

当时，段焕巍是新四军一师二旅副旅长，李珊在二旅卫生部当教导员。

1943年3月，段焕巍、李珊夫妇带着女儿苏淮到东台县靠黄海边不远的大桥镇准备启程。从师部出发后，走了一整夜，刚在涟水县西北约十余公里的大黄庄里住下来，就被“扫荡”的日军包围了。段焕巍带领护送部队在村庄西北冲开缺口，用密集火力掩护所有人突围。等到打退日军、跟上大家的时候，才发现妻子李珊和孩子都不见了，他又着急又担心。第二天，地方干部把她们送了回来。原来李珊抱着孩子跑不快，见三旅政治部主任卢胜受伤后满身鲜血，便和卢胜一起在老百姓家里躲藏起来。

在火车上，他们遇到了日本宪兵和伪警察的严密搜查；过汾河时，李珊背着孩子一下子陷在齐腰深的淤泥里，多亏旁边有人，把她们拖了出来。他们带着孩子经过了20多道封锁线，穿越了400多公里敌占区，途经10余处革命根据地，行程共2500多公里，历时半年多，才从苏中抗日根据地到达延安，参加了中共历史上极具重要意义的七大。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段焕巍是正式代表，李珊为候补代表。段焕巍在回忆录中写道：“750多人济济一堂，中国共产党此前的代表大会从来没有这样大的规模、这样隆重热烈！”

会后，李珊专门做了一个皮挎包，收藏夫妇俩的中共七大代表证，并随身携带。20多年里，这两张代表



段焕巍、李珊的中共七大代表证(茅山新四军纪念馆藏)

证一直没有离开她的身边，直到她1969年去世。后来，段焕巍又把这两张中共七大代表证与家里的照片一起放在铁盒子里保存起来。1998年他去世后，子女们在整理遗物时，才发现了这两张代表证。2007年，段焕巍的子女将它们捐赠给茅山新四军纪念馆。2011年，江苏省文物局文物鉴定专家组鉴定其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太原文井出土的新石器时代二音孔陶埙(山西博物院藏)

太原西南部的义井，有一处新石器文化遗址，鲜为人知。

1953年以来，汾河西岸不断有古文化遗址发现，其中以义井村考古发现命名的义井文化遗址最具代表性。遗址位于晋源区义井街道办事处义井村西的台地上，背靠西山，东临汾河谷地，遗址面积约150万平方米，专家称之为“义井文化”。

义井文化遗址做过两次小型试掘，发现文化层厚度为2米至3.44米，出土有圆形灰坑、瓮棺墓葬及陶器、石器、骨器等。

灰坑是考古工作者对古人利用凹填埋垃圾形成遗迹的形象称呼。史前灰坑多为地穴式房子废弃后倾倒垃圾形成，是考古断代和研究古代人类经济生活的重要依据。义井遗址发现的灰坑为圆形，由人工挖成，推测可能为义井先民的一个窖藏坑。像这样的灰坑，在同一文化性质的太谷白燕遗址中也有发现，学者研究认为它属于窑洞式居址，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窑洞，也是晋中盆地义井文化先民为中华民族、特别是北方地区民众生活作出的一大贡献。基于它具有适宜在北方黄土高原建筑的优点，所以很快就传播到我省晋南、甘肃东北部、宁夏南部等地。到龙山时代，它已经成为晋中盆地先民的主要居住形式。

义井遗址中，还发掘瓮棺墓葬一座，由两个粗砂质灰陶罐相扣组成。遗址出土的石器大多已残毁，器型有斧、刀、杵、锤、纺轮、敲砸器、研磨器、环、球和砾石等；骨角器种类有箭头、锥、针、簪、加工胛骨等。义井出土有不少骨箭头，说明狩猎在义井先民的生产生活中占有一定地位。遗址中还有一个经过加工的胛骨，边沿和表面局部有磨过的痕迹，在短边沿钻有一个半圆形孔，这说明当时人们以甲骨占卜，反映了义井先民的意识形态，它和商周时期以甲骨占卜是一脉相承的。

出土陶器有泥质灰陶、夹砂灰陶、彩陶三类，器物有敛口罐、钵、碗、盆、纺轮、陶刀、陶镰、环、圆盘形陶器、圆形小陶饼等。陶刀22件，都用残破的陶片或彩陶片慢慢磨制成长方形，其中有几把刀在中央钻有孔洞。陶镰一件，长条形，边沿磨成刃状，泥质，灰色，似用陶片磨成。陶刀、陶镰一般用来收割粮食，这说明当时义井的农业活动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

尤为令人惊奇的是，义井遗址出土了一件二音孔陶埙，发出的三个音构成两个音程，一个小三度和一个完全四度，系太原地区发现的最早乐器。

义井遗址出土的彩陶最具特色，颜色丰富，常见红色、褐色、紫色、黑色少量。图案复杂，有垂带纹、背向双钩纹、网格纹、棋盘格纹、对角三角纹、条带纹、同心圆纹等，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据此，一些学者们将这一类遗存称作“义井文化”。

义井文化距今约4800年至5200年，范围以晋中、忻定盆地为主。这一时期，中原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化的趋势开始加强，在晋中盆地周围，几乎同时出现一些新的考古学文化，如甘肃的马家窑文化、内蒙古的海生不浪文化、河南的大司空文化和秦王寨文化等。在这一背景下，太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先民的表现尤为突出，义井文化脱颖而出。它一改庙底沟文化的传统，积极同外部进行交流，同时保持着独立性，第一次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为以后的文化时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明宝钞



大明通行宝钞中书省二百文(山西博物院藏)

大明宝钞是明代文物，存世不多，这件“大明通行宝钞中书省二百文”为山西博物院所藏。

“大明通行宝钞中书省二百文”长27厘米，宽16.5厘米。宝钞采用桑皮纤维做钞料，钞纸纤维细长，深蓝色。宝钞正面有龙纹边框，边框上的横额为“大明通行宝钞”六字。边框内上层两侧分别为叠文篆书“大明宝钞”和“天下通行”八字。中间横书钞文“貳佰文”。钞额下面绘钱串图，一串象征一百文。边框内下层楷书“中书省奉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贰佰伍拾两，仍给犯人财产。洪武××年××月××日”。文字上盖篆书“印造宝钞局”朱文印一方。背面下层有龙纹边框，框内横书钞额和钱串图。

据史料载，明洪武八年(1375)建立纸币本位制度，设钞提举司，立钞法，“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所发行的“大明通行宝钞”并非兑换纸币。洪武十三年(1380)废中书省，印钞改属户部。中书省发行宝钞仅5年，传世稀少。

来源：山西博物院



博古人物纹对瓶



“宝鼎”仿生树桩熏炉



“秋塘”款白釉异形瓶

太原先民创造义井文化

贾晓峰 常一民 姬凌飞